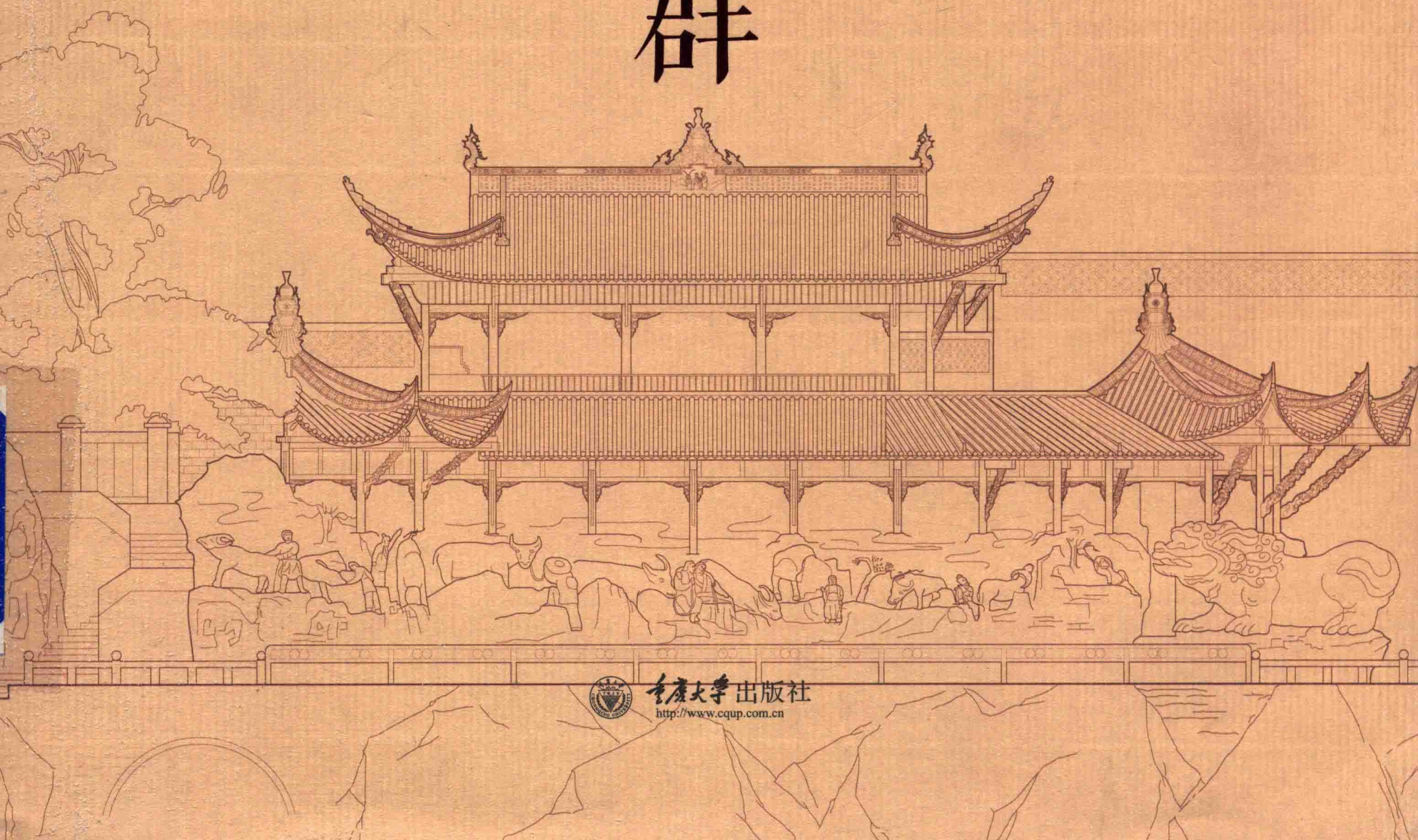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 中国西南古建筑典例图文史料

大足石刻与古建筑群

张兴国 郭璇 陈蔚 总主编
李先逵 郭璇 陈蔚 冷婕 编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12879.27
3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 中国西南古建筑典例图文史料

大足石刻与古建筑群

DAZU SHIKE YU GUJIANZHUQUN

张兴国 郭璇 陈蔚 总主编

李先逵 郭璇 陈蔚 冷婕 编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足石刻与古建筑群 / 李先逵等编著. —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5.3

(中国西南古建筑典例图文史料)

ISBN 978-7-5624-8783-8

I. ①大… II. ①李… III. ①大足石窟—介绍②寺庙—古建筑—介绍—重庆市 IV. ①K879.27②K928.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10560号

中国西南古建筑典例图文史料
Pictorial Historic Recordings of Representative
Ancient Architecture in Southwest China

大足石刻与古建筑群

Dazu Rock Carvings And Ancient Buildings

李先逵 郭璇 陈蔚 冷婕 编著

策划编辑: 林青山 张婷

责任编辑: 张婷 版式设计: 李南江 张婷

责任校对: 刘雯娜 责任印制: 赵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邮编: 401331

电话: (023) 88617190 88617185 (中小学)

传真: (023) 88617186 88617166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邮箱: 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市金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10×1020 1/8 印张: 36 字数: 944千 插页4开1页

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8783-8 定价: 350.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序

中国国土广袤，地貌、气候多样，决定了其建筑体系下各地建筑呈现出丰富的地域特征，反映了文化的多元性。四川盆地、云贵高原，地形复杂、气候多变，该区域内的传统建筑取材丰富、形态多姿，是我国民族和地域建筑的宝库。《中国西南古建筑典例图文史料》书系囊括了西南地区最具有代表性的古建筑的案例，其中包括：世界文化遗产、中国石窟寺的奇葩——大足石刻，我国明代官式建筑的经典案例平武报恩寺，西南禅宗祖庭梁平双桂堂，以及民间祠庙会馆建筑和摩崖风景建筑的杰作镇远青龙洞。这些古建筑均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而该书系以翔实的史料、丰富的图文，全面记录了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揭示了其价值，因而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学术意义。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作为全国历史最悠久的八所建筑院系之一，创办该院系的老一辈学者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参与了中国营造学社对西南地区传统建筑的调查与研究，为创建中国的建筑史学、探索

中国建筑史研究方法作出了历史贡献，培养了不少人才并组成了中国建筑科学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重庆分所，其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学术积淀深厚、地域特色鲜明，并积累了大量的传统建筑实测资料。《中国西南古建筑典例图文史料》是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多名专家学者近三十年来对西南地区的文物古迹和历史建筑的调查研究成果以及多年来该学院师生对古建筑测绘、研究的成果集合。这些成果不但是师生们辛勤劳动的结晶，而且是十分珍贵的重要历史文献。今将这些珍贵资料汇编成书系出版，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特别是“五·一二”汶川大地震后，这些古建筑测绘资料将是西南地区古建筑保护与修复的重要、可靠的图文史料依据，为今后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可靠的研究基础。

愿书系的出版激发更多有识之士和民间大众对我国建筑遗产的珍视和保护之情。

晋宏逵

2013年夏初于故宫博物院

丛书序

西南地区悠久的历史曾经有过光辉灿烂的建筑文化。云南元谋遗址，重庆大溪遗址，成都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都反映出西南地域优秀的建筑文化成就；东汉的崖墓、汉阙、画像石与画像砖，反映了早期中国建筑形制及其优秀的建筑文化技术水平；唐宋摩崖石刻中的建筑形象，折射出西南地区佛教建筑的高峰水平。西南地域辽阔，地形地貌复杂，民族民俗文化丰富，明清以来遗存的古典建筑呈现多元化和地域化特色。

西南地区遗存的古典建筑，是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和技术遗产。但古建筑的设计施工主要靠世袭工匠言传身教，尤其是地方性民间性的古建筑，更是靠经验积累相传，少有文献记载，更无图纸档案留存。要系统整理这笔巨大的遗产，需要大量而艰苦的田野调查，尤其是准确的建筑测绘资料整理。从20世纪上半叶起，梁思成、刘敦桢等大批建筑界前辈，为中国建筑研究和测绘调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西南地区的古建筑调查测绘，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中国营造学社先辈们对云南、四川古建筑的调查研究。调查研究类型涉及寺观、衙署、祠庙、会馆、城堡、桥梁、民居、塔幢、崖墓、墓阙等，并在《中国营造学社会刊》发表《云南一颗印》《宜宾旧州坝白塔宋墓》《旋螺殿》《四川南溪李庄宋墓》《云南之塔幢》《成都清真寺》等文，应是最早公开出版的西南古建筑研究成果。后来不少营造学社的先辈到高校执教，如梁思成、刘敦桢等，是高校古建筑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先驱。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叶仲玑先生，他就有过中国营造学社的工作经历，来到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任首届系主任，营造学社的精神在建筑系无形延续。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古建筑测绘，主要由全国建筑高校承担起

来。重庆建筑工程学院是当时西南地区唯一拥有建筑系的高校。结合教学和科研工作，建校之初就建立了建筑历史研究室，并成立中国建筑科学院建筑历史研究所重庆分所。研究室的学者来自全国各地，辜其一、叶启燊、邵俊仪、吕祖谦、吕少怀、余卓群、白佐民、尹培桐、罗裕锟、杨嵩林、万钟英等，是建筑历史研究室开创以来的老一辈学者，他们对西南地区历史建筑研究作出了贡献，并培养了大批从事建筑历史理论研究的人才，他们的精神深深影响着建筑历史理论研究的后来者。

建筑历史研究室的老一辈们，对历史建筑研究有锲而不舍的精神，扎根西南地区几十年甚至默默奉献一生。担任首届历史研究室主任的辜其一先生，在极其困难的20世纪60年代，几乎走遍了巴蜀大地，坚持巴蜀地区的汉唐古建筑研究，系统调查整理巴蜀的东汉崖墓建筑，绘制出测绘图文手稿两大册，他在“文革”中含冤而去，可惜没能最终整理出版；幸运的是他早期调查整理的摩崖石刻中的唐宋建筑，通过《文物》杂志发表，成为研究巴蜀唐宋建筑珍贵的图文史料。叶启燊、邵俊仪等先生，系统开展了四川民居的调查测绘，他们还深入川西高原的羌藏地区、大凉山的彝族山区，开展对少数民族建筑的调查研究，部分资料已整理出版，叶启燊先生所著的《四川藏族住宅》是其中重要的研究成果。曾师从于刘敦桢的邵俊仪先生，调查整理发表了《重庆吊脚楼民居》学术论文，在传统吊脚楼民居荡然无存的重庆城区，其图文史料价值显得尤其珍贵。

几十年来，结合教学与科研工作，建筑系的师生测绘了上百项古建筑，并留下大量测绘图文资料档案。平武报恩寺、成都杜甫草堂、成都武侯祠、成都望江公园、眉山三苏祠、峨眉山寺庙群、青城

山道观、大足圣寿寺、潼南大佛寺、涪滩二佛寺、镇远青龙洞、重庆湖广会馆、梁平双桂堂、重庆老君洞道观等，都是这些年来有代表性的古建筑测绘项目。这些测绘资料成果，成为国家及地方文物保护单位的必备资料档案，更为文物保护修复设计提供了技术支持。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平武报恩寺遭到地震的摧残，师生们30年前的测绘资料，其用于修复设计的价值凸显。近20年来，结合民居研究、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开展了民居建筑群、古镇古村落的测绘调查。重庆双江民居、贵州镇远民居、习水土城古镇、四川古蔺太平古镇、四川肖溪古镇、重庆东溪古镇、重庆涪滩古镇等，都是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测绘研究成果。

由于诸多原因，几十年的研究成果，较多的留存在档案室，甚至不同程度地损坏缺失，没能公开整理出版，甚为遗憾。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的资助，激励我们将这些研究成果整理出版。《中国西南古建筑典例图文史料》首批整理了四川平武报恩寺、贵州镇远青龙洞、重庆梁平双桂堂、重庆大足石刻与古建筑群等测绘资料，并由重庆大学出版社组织出版。这四组古建筑群的测绘时间跨越了30年，代表不同时期的测绘资料成果，反映不同历史时期和地域特色的建筑。平武报恩寺是巴蜀明代的建筑原物，反映了典型的北方官式建筑风格风貌，对其的测绘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即七七级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完成的；贵州镇远青龙洞是一组具有特色的摩崖式古建筑群，建筑群依附于陡峭的崖壁，出挑吊脚，凌空飞架，是山地建筑空间组织和营造技术的优秀典例；大足石刻是中国南方佛教石窟寺的杰出代表，大足圣寿寺是一组丘陵山地古建筑群，建筑布局结合坡地起伏变化，逐步往后升高，群体空间轮廓线尤为突出，其山门运用牌楼门式处理手法，

在巴蜀地区的佛教建筑群中具有代表意义；测绘于21世纪初的梁平双桂堂，被誉为“西南禅宗祖庭”，其空间组合既强调佛教寺院的轴线空间序列，又巧妙结合民间院落空间组织特色，在建筑营造技术上，巧妙运用石木组合构架技术，建筑的地域特色浓厚，是佛教建筑地域化特色的典型例证。

《中国西南古建筑典例图文史料》所呈现的，仅是几十年测绘成果的一部分，我们希望以此为契机将整理、出版工作继续进行下去。西南地区的古建筑类型极其丰富，有价值的建筑遗产远远不止这些，需要更多团队和有志于古建筑的研究人员去抢救和整理，一系列完整的西南古典建筑图文史料才将会展现于世。

《中国西南古建筑典例图文史料》的出版，得到东南大学建筑学院齐康院士、故宫博物院前副院长晋宏逵先生、重庆市名城专委会主任何智亚先生、中国三峡博物馆馆长程武彦先生、重庆市文物局前副总工程师吴涛先生等专家和支持和积极推荐，特此表示感谢！

《中国西南古建筑典例图文史料》，涉及几百位建筑专业学生的辛勤劳动，他们既学习又奉献。资料的整理、出版，更是对从事古建筑研究的老一辈研究学者的最好纪念。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

张其成

中国西南古建筑群例图文史料
大足石刻与古建筑群

前言

中国北方石窟寺大多数始于南北朝、盛于隋唐，并以丝绸之路沿线的敦煌莫高窟、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以及黄河流域的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最为著名。公元8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李唐王朝的政治变迁和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文人雅士、高僧大德、名工巧匠汇集蜀中，加之蜀王崇佛、密宗流行，为四川石窟寺的开凿创造了条件。在北方石窟寺衰落之际，巴蜀地区石窟、摩崖造像的开凿反而盛极一时，独领全国之冠，并且一直延续至南宋，呈现出中国石窟发展史上最后一个高潮。现存的巴蜀石窟寺、摩崖佛寺在四川的广元、安岳，重庆的大足、潼南、合川等均有广泛分布。

大足位于四川盆地东南的重庆西部，目前境内存有石窟、摩崖石刻多达70余处，造像5万余尊，铭文10万余字。“大足石刻”是大足境内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北山、宝顶山、南山、石门山、石篆山（简称“五山”）的石窟寺、摩崖石刻、古建筑群及其环境的总称。大足石刻始建于公元650年（唐永徽元年），兴盛于9世纪末至13世纪中叶（晚唐景福元年至南宋淳祐十二年），余绪延至明、清，是中国晚期石窟艺术的代表作品，也是世界石窟艺术中最为壮丽辉煌的一页。

北山石窟位于大足北山之巅，石刻长廊延续里许、状如新月，集晚唐、五代和两宋作品于一处，展示了晚唐以后各个时期石窟造像的风貌，其造像尤其以精美细腻、技艺精绝著称。北山景区内还坐落着宋代八层（外观为十三层）楼阁式砖塔一座，与石刻一同见证着岁月的沧桑。

宝顶石窟坐落于宝顶山（又名香山），其主体部分大佛湾位于一马蹄形的山谷内，由南宋名僧赵智凤开创，经营七十余年始成。宝顶大佛湾石刻是我国南宋石窟造像的杰出代表，也是我国极为罕见的有完整总体规划的由一人主持建造的大型佛教密宗道场。宝顶石窟以大佛湾为中心，方圆五里文物古迹众多，包括作为大佛湾营建蓝本的小佛湾石窟造像、川东名刹圣寿寺古建筑群、倒塔、广大寺等文物以及香山场老街。

南山、石门山、石篆山石窟造像虽然规模不及北山和宝顶山，但南山是我国道教题材石窟的典型代表之一，石门山、石篆山造像则

反映了佛、道合一以及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特殊文化内涵。

1999年12月，根据世界文化遗产遴选标准的（Ⅰ）（Ⅱ）（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3届会议表决通过大足石刻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大足石刻成为继敦煌莫高窟之后中国第二个石窟类的世界文化遗产。

大足石刻造像题材广泛、形象生动、技艺精湛，其高超的艺术成就以及丰厚的文化内涵已为诸多专家学者所揭示。然而在较长的时期内，对于大足石刻的研究多停留在造像艺术的范围内，而相对忽略了石窟寺和摩崖的整体空间环境特征及其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与科学价值。除造像风格独树一帜外，大足石刻与北方石窟寺的重大不同之处在于，其空间形式进一步弱化了早期石窟寺以洞窟为主的空间形式，主要采取在天然崖壁上雕凿浅龛或直接造像的摩崖石刻形式。这一点在宝顶山体现得最为突出，除圆觉、毗卢两洞窟外，宝顶大佛湾造像完全铺陈分布在绵延500余米的天然崖壁上，气势恢宏、蔚为壮观。摩崖石刻的广泛开凿不仅仅反映了石窟寺这一外来建筑形制与四川本土在汉代就广为流行的摩崖造像的结合，更反映了佛教传入中国后的本土化过程。事实上从洞窟到摩崖建筑空间环境的演变，可以从新疆地区早期的克孜尔石窟到敦煌的莫高窟，再到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的窟形变化历程明确得知；而以大足石刻为代表的四川盆地摩崖石刻则呈现了佛教石窟寺空间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足见其历史价值之重大。另一方面，大足石刻（尤其宝顶大、小佛湾）是我国目前所知仅存的有整体规划设计的石窟寺之一（另一处位于重庆合川的二佛寺下殿），其在地形的选择、雕刻主题的组织、窟龕结构、排水设计以及力学运用等方面均有全面和缜密的设计与考量，其所承载的科学技术价值仍有待进一步挖掘。此外，大足石刻还是摩崖造像与窟檐、古建筑等历史遗存以及山水整体环境等有机联系而共同构成的文化遗产群。宝顶山、北山等处的窟檐虽多为清以后重修，但其结构质朴、顺手拈来，与地形谐调而不失趣味，是西南传统山地建筑的代表。圣寿寺古建筑群是西南佛教建筑的典例之一，其空间布局、建筑形制与结构、装饰与装修等都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在我国地方建筑史的研究中具有重

要的地位。近年来，大足石刻的摩崖山水园林特征和作为风景名胜区的文化景观特质得到了更进一步的认知。在文化遗产保护逐步从单体走向群体、从孤立保护走向合纵联横的今天，对大足石刻综合价值的认知和挖掘仍有广阔的空间。

自20世纪上半叶开始，文物、考古、建筑、历史与美术等各个领域的学者和社会人士对大足石刻的研究与保护开展了大量的工作。早在烽火连天的1940年，因抗日战争而西迁的中国营造学社的学者们第一次对西南地区的古迹遗存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刘敦桢先生在《川、康古建筑调查日记》中曾以文字和照片对大足北山、宝顶山以及潼南大佛寺等唐、宋摩崖石刻和古建筑进行了记录。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南文教部、国家文物局等多次拨款，对大足石刻和古建筑群进行保护。日常维修与保护中严格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并采用传统方法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的手段，不仅在设计、材料、工艺、布局等方面均保持了历史的真实性，同时注重对石刻、古建筑及其周围环境的整体性保护。历经大半个世纪，大足石刻遗产群的价值不断得到揭示并完好保存至今。1992年夏天，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现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师生开展了对大足石刻（主要是北山和宝顶山）以及圣寿寺等古建筑群的调查与测绘，这是第一次也是迄今对大足石刻最为全面的一次测绘。此次测绘共完成精美的测绘图手稿百余张，直接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大足石刻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料。此后，李先逵教授等主持了《大足三山（宝顶山、北山、南山）石刻文物名胜区保护总体规划》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大足石刻研究与保护》。1998年张兴国教授带领青年教师孙南飞、陈蔚等完成了《大足石刻文物区的环境整治规划与设计》等，进一步推进了大足石刻的保护和申遗工作。近年来，文化遗产的预防性保护日益受到关注，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被确定为我国世界遗产动态监测实施的示范遗产地之一，并获得意大利政府资助开始建设我国首个石质文物保护中心。为了更好地保存大足石刻与古建筑群相关的历史文物信息，2010年，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的中青年教师指导建筑学本科学

生对90年代的原始测绘图手稿进行了数字化处理。2012年，笔者有幸承担了国家文物局动态信息系统和监测预警系统试点项目的子课题《大足石刻世界遗产监测与预警指标体系研究》。2013年包括《大足石刻与古建筑群》在内的《中国西南古建筑典例图文史料》丛书得到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使得这批珍贵的史料终得以问世。大足石刻的保护凝聚了几代人的心血和努力。

作为一本着重从建筑学角度介绍大足石刻的书籍，本书在展现精美绝伦的石刻造像的同时，注重呈现大足石刻的总体布局、空间环境和古建筑遗存。开篇对大足石刻的地理和历史沿革进行简要的介绍；第二部分对大足石刻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进行描述；第三部分作为全书的主体，以图、文、照并茂的方式对大足石刻文化遗产群包含的石窟、石刻、窟檐、窟廊、佛塔、佛寺、碑文等进行全面的记录和呈现。北山和宝顶山是大足石刻中价值最高也是内容最丰的部分，本书北山部分保留了20世纪90年代原始测绘图纸的面貌，宝顶佛湾和圣寿寺建筑部分则以近年来数字化图纸成果为主，除石窟、石刻、古建筑的平、立、剖面图纸外，还收录了北山石窟和宝顶大佛湾摩崖石刻造像手绘展开立面长卷以及圣寿寺古建筑构造和雕刻装饰细部详图等。本书的最后部分将大足石刻的文物调查及考古发掘资料、建置与保护大事年表等进行了梳理。

本书编撰过程中得到了多位同行和相关人士的支持。特别感谢大足石刻研究院黎方银院长、赵岗研究馆员等在本书编写过程中提供的帮助。最后，也对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建筑历史研究所全体老、中、青教师在历年来的古建筑调查测绘和研究中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衷心的感谢。本丛书的出版是对历史文化遗产调查与研究工作的最好纪念。由于编者的水平有限，书中错误、疏漏在所难免，敬请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
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

郭璇



目 录

大足石刻地理与历史沿革	1
一、大足石刻地理环境与分布	2
二、大足石刻历史沿革	2
大足石刻世界遗产突出的普遍价值	5
大足石刻与古建筑群	9
北山	11
一、北山文物概述	11
二、北山历史沿革	11
三、北山佛湾	12
四、北山彩版	31
宝顶山	66
一、宝顶山文物概述	66
二、宝顶山历史沿革	67
三、大佛湾	72

四、小佛湾	96
五、圣寿寺	99
六、宝顶山附属文物	182
七、宝顶山彩版	183
南山·石篆山·石门山	243
一、南山	243
二、石篆山	245
三、石门山	246
四、南山·石篆山·石门山彩版	249
附录	268
文物调查及考古发掘资料（1939—2003）	268
大事记	270
参考文献	273
后记	275

大足石刻地理与历史沿革



一、大足石刻地理环境与分布

大足位于重庆市西部，是沱江与涪江两大水系的分水岭，东距重庆市区 120 千米，西距成都市 260 千米。大足石刻造像区多处于海拔 400~500 米的山地中，其中北山海拔 545 米，宝顶山 529 米，南山 514 米，石门山 374 米，石篆山 444 米。大足区地貌属川东侵蚀剥蚀坪状红色丘陵区，丘陵的顶部为厚层砂岩，丘陵斜坡由砂岩、泥岩相互叠置而成，砂岩在地形上为直立的陡壁或陡坡，泥岩形成缓坡，这为摩崖石刻的开凿创造了很好的自然条件。摩崖造像主要分布于丘陵斜坡砂岩陡壁上或切割形成的沟谷砂岩陡壁上，岩石出露厚度为 10~30 米。

大足地区受地形和大气环流影响，云雾较多，日照较少，地区内温差变化较小。降雨期集中在春夏季，降水量充沛，水对石刻的影响很大。常年风速小，以东北风向为主，石刻受风的影响较小。但整体处于盆地，四周被高山包围，空气湿度大，水气不易散失，容易在石刻表面形成凝结水，对石刻造成侵蚀。

大足区域内围绕着窟窿河、濑溪河、雍溪河散置大小石窟、摩崖造像点多达几十处，其中以五山为代表的大足石刻包含了大量的摩崖造像、古建筑、古遗址、附属文物，以及与大足石刻密切相关的山水景观环境。大足石刻摩崖造像点共计 26 处：北山——佛湾、营盘坡、观音坡、佛耳岩摩崖造像；宝顶山——大佛湾、小佛湾、广大山、松林坡、佛祖寺、佛祖岩、菩萨堡、岩湾、龙潭、对面佛、珠始山、仁功山、大佛坡、龙头山、三元洞、撑子佛、高观音、三块碑、山王庙摩崖造像；南山摩崖造像；石门山摩崖造像；石篆山摩崖造像。包括古建筑 10 处：北山——多宝塔（北塔）；宝顶山——圣寿寺、大佛湾、释迦真如舍利宝塔、转法轮塔（倒塔）、小佛湾、广大寺；南山——玉皇观；石门山——圣府洞；石篆山——佛惠寺。遗址 1 处：北山——北塔寺遗址。除文物古迹之外，五山附近还分布有响水滩水库、玉滩水库、龙水湖、跃进水库、化龙水库和上游水库等多个自然风景资源，与石窟、石刻、文物建筑、遗址等共同形成了景色如画、内涵丰富的风景名胜區。

二、大足石刻历史沿革

大足石刻在唐代末年开始兴盛，经五代至南宋达到鼎盛，并一直延续至明清。

大足石刻现存最早的作品为开凿于唐永徽至乾封年间（650—666 年）的尖山子摩崖造像，但大量开凿石窟的时期为唐景福元年（892 年）。是年，昌、普、渝、合四州都指挥、静南军使韦君靖在大足城西北的龙岗山建永昌寨，“粮贮十年，兵屯数万”静观其变。有感于“邑有仓箱之咏，俗多襦袴之谣”，促成了“求瘼之念弥坚，除害之心尤切”，于是在建寨同时，开始凿北山佛像。他组织当地能工巧匠凿石造像，务“凿出金仙，现千手千眼之威神，具八十种之相好”，首开北山石刻艺术的先河。今之佛湾第 3、5、9、10 等号龕窟便是那时凿成的。从此，州县官吏、地方士绅、僧尼、平民等，相继效法，历经前蜀至后蜀广政造像不断，从而掀起大足石刻建设史上第一个造像高潮。造像地区，从北山佛湾扩展至北山台地范围的营盘坡、佛耳岩、观音坡、北塔寺各处，但均在韦君靖营建的永昌寨区域，即今北山石窟范围内；造像题材有释迦佛、三世佛、阿弥陀佛、千手观音、地藏、北方天王、十六罗汉和观经变、药师变等；造像数量占今北山石窟总量的半数以上。

唐及五代的石刻造像多集中在北山。五代时期，前蜀永平五年（915 年），右衙第三军散副将种审能在北山造像。在前后蜀时期，北山造像不断，是五代时期全国造像最多的地区之一。

宋初，昌州升为上州，大足升为上县。时至宋高宗南渡临安（杭州），宋王朝偏安江左，特许四川举子应考进士免入京殿试，朝廷派员来川设考，称之为“类省试”。昌州一度成为朝廷进行类省试的“置司”之州，即潼川府路治所在地。南宋淳熙十三年（1186 年）四月，应试举子资中刘子发等题刻北山佛湾“较试南昌毕事之三日……拉游北山，徜徉竟日”。至今墨迹犹新。可见，宋时昌州治大足，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地位和影响大大扩展，一时还成为潼川府路治的活动重心，士大夫、富商、庄园主集居，从而加快了大足的经济发展和文

化交流,为大足石刻的勃兴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环境和厚实的基础。大足石刻在两宋时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北宋元丰五年至绍圣三年间(1082—1096年),庄园主严逊出资并役工,在石篆山建造摩崖雕像14龕,题材包括儒、释、道三教造像,并种松柏数十万株。北宋绍圣元年至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094—1151年)开凿石门山摩崖造像:蜀中名僧希昼营造“三教”石窟;绍圣年间,士绅杨才友等开凿石门山佛、道造像区;大观、政和年间,士绅马道子、邓惟明等继续在北山石窟摩崖造像;绍兴年间,乡贡进士何浩父子,舍地开山,营造南山道教造像窟,与之同时,“庄主”古及之等,凿造佛安桥“三教”石窟等。这一时期,四乡造像此起彼伏,大足石刻迎来建设史上第二个造像高潮。特别是北山造像惹人注目:南宋建炎、绍兴年间的昌州刺史任宗易、张莘民和录事参军赵彭年等出资凿造佛湾第149、136号大型洞窟,泸南沿边安抚使冯大学出六百贯文足造多宝塔第六级。可见当时造像之盛况。

南宋时期是大足石刻发展的巅峰时期。在继续发展北山等地的摩崖石窟基础上,在大足宝顶山营造了著名的密宗道场——大佛湾石刻,并在南山开凿南山摩崖造像。除了民间及僧众出资建造摩崖石刻外,官方亦在大足石刻的寺院内建塔开龕。如南宋绍兴十八年至二十五年(1148—1155年),潼川府路兵马都钤辖泸南沿边安抚使冯楫捐资建造北山多宝塔第六级。

南宋石刻中最有影响的是南宋淳熙至淳祐年间(约为1174—1252年),僧人赵智凤在宝顶山建造宏大的密宗道场。其时,四乡造像几近停歇,考古只在宝兴乡僻静的山腰间发现一处灵岩寺小型石窟以及纪年造像铭记4件。而宝顶造像却异军突起,开始了大足石刻建设史上第三次造像高潮,把大足石刻造像推向鼎盛。宝顶山石窟,摩崖造像近万,刻写经偈颂文数以万计。“清苦七十余年”,有总体构思地营建成一座以大小佛湾为中心的“完备而别具特色的密教石窟道场”。大佛湾造像数千躯,图文并茂,题材无一重复,内容前后相映,在石窟艺术群中独树一帜,为世所罕见。至此,大足石刻已达到巅峰。

大足石刻建设,自“元季兵燹”一劫,走向衰落。元代造像中断,明初复苏,但少创见,规模和造诣都不如前,内容也大都是前期造像的延续,好景不长。明代后期,形势逆转造像中断,直到清乾、嘉世,又才见新开凿石窟造像,然已是余波尽头的反映,但也不乏时代佳作。如宝顶山佛祖寺,清刻圆雕罗汉像,即可与唐宋石刻交相辉映。

明、清代造像,尽管规模多不很大,题材、内容也较庞杂,但却是世俗宗教信仰和造像题材变化发展的真实反映。它作为大足石刻兴衰史的组成部分,是具有一定的历史、研究价值的。

宋以后,大足石刻处于衰微期,但是大足石刻圣寿寺、广大寺等古寺庙却在明清之际屡废屡建,形成了具有巴渝特色的大型山地寺院,成为大足石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大足石刻是中国晚期石窟艺术的代表作,在题材和形式的选择上,注重雕刻的哲理阐述和故事性,是佛教文化形象化的普及教材。其中宝顶山摩崖石刻是我国极为罕见的具有完整创作构思的石窟群之一,其整体布局、立意完整展现了佛教密宗教义,蕴含了特殊的文化景观价值。

此外,大足石刻造像因地制宜,巧妙地将防水、排水、采光、力学、声学等原理和造像有机结合,完美地解决了形式和功能要求。大足石刻根据岩石层理构造和崖壁方位,选择雕刻区域,降低了自然条件对石刻的负面影响,摩崖造像还特别注意山体结构的特点对造像的影响,采取了高超的石窟防渗、排水以及力学方面的工程措施,达到了宗教主题与艺术表现的要求,反映了当时先进的工程技术与科学水平。

1961年,国务院公布北山摩崖造像、宝顶山摩崖造像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南山摩崖造像、石篆山摩崖造像、石门山摩崖造像和北山多宝塔,被列入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舒成岩、妙高山、尖山子、千佛岩为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圣寿寺、三教寺等67处为大足县文物保护单位。1999年12月,由于符合世界文化遗产遴选标准的(I)(II)(III),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3届全体委员大会同意大足石刻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继敦煌莫高窟之后中国第二个石窟类的世界文化遗产。

大足石刻世界遗产突出的普遍价值

“五山”摩崖造像保存完好。全部龛窟与造像，除历史上对少数雕像肢体残损部分有过补塑外，未遭受大的人为和自然灾害的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其日常维修保护严格遵守“不改变原状”的原则，以确凿的文献、碑刻题记为依据，采用传统技术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的手段进行，在设计、材料、工艺、布局等方面均保持了历史的真实性。在对“五山”造像主体进行保护的同时，注重其周围环境的保护，基本上没有改变其环境关系。因此，从总体上看，“五山”摩崖造像基本上保持了历史的规模、原状和风貌。

大足石刻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

1. 大足石刻是一件伟大的艺术杰作

大足石刻是大足县（今为大足区）境内主要表现为摩崖造像的石窟艺术的总称。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摩崖造像多达 75 处，雕像 5 万余尊，铭文 10 万余字。北山、宝顶山、南山、石篆山、石门山摩崖造像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规模之大、造诣之精、内容之丰富，堪称伟大的艺术杰作。北山造像依岩而建，龛窟密如蜂房，被誉为公元 9 世纪末至 13 世纪中叶间的“石窟艺术陈列馆”。宝顶山大佛湾造像长达 500 米，气势磅礴，雄伟壮观；变相与变文并举，图文并茂；布局构图谨严，教义体系完备，是世界上罕见的有总体构思、历经七十余年建造的一座大型石窟密宗道场。其造像既追求形式美，又注重内容的准确表达，故事内容所体现的宗教、生活哲理对世人能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诱之以福乐、威之以祸苦，涵盖社会思想博大，令人省度人生、百看不厌。南山、石篆山、石门山摩崖造像精雕细琢，

是中国石窟艺术群中不可多得的释、道、儒“三教”造像的珍品。

2. 大足石刻对中国石窟艺术的创新与发展有重要贡献

大足石刻注重雕塑艺术自身的审美规律和形式规律，是洞窟造像向摩崖造像方向发展的佳例。在立体造型的技法上，运用写实与夸张互补的手法，摹难显之状、传难达之情，对不同的人物赋予不同的性格特征，务求传神写心；强调善恶、美丑的强烈对比，表现的内容贴近生活，文字通俗，达意简赅，既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又有着极大的社会教化作用。在选材上，既源于经典，而又不拘泥于经典，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创造性，反映出世俗信仰惩恶扬善、调伏心意和规范行为的义理要求。在布局上，是艺术、宗教、科学、自然的巧妙结合。在审美上，融神秘、自然、典雅三者于一体，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重鉴戒的审美要求。在表现上，突破了一些宗教雕塑的旧程式，有了创造性的发展，神像人化，人神合一，极富中国特色。总之，大足石刻在诸多方面都开创了石窟艺术的新形式，成为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以及体现中国传统审美思想和审美情趣的石窟艺术的典范。同时，作为中国石窟艺术发展、变化的一个转折点，大足石刻所出现的许多有异于前期的新因素又极大地影响了后世。

3. 大足石刻是石窟艺术生活化的典范

大足石刻以其浓厚的世俗信仰、纯朴的生活气息，在石窟艺术中独树一帜，把石窟艺术生活化推到了空前的境地。在内容取舍和表现手法方面，都力求与世俗生活及审美情趣紧密结合。其人物形象文静温和，衣饰华丽，身少裸露，形体上美而不妖、丽而不娇。造像中，

无论是佛、菩萨，还是罗汉、金刚，以及各种侍者像，都颇似现实中各类人物的真实写照。特别是宝顶山摩崖造像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情景之广泛，几乎应有尽有，颇似 12 至 13 世纪中叶（宋代）的一座民间风俗画廊。无论王公大臣、官绅士庶、渔樵耕读，各类人物皆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大足石刻中的“五山”摩崖造像，可以说是一幅生动的历史生活画卷，从各个侧面浓缩地反映了公元 9 至 13 世纪（晚唐、五代和两宋时期）的中国社会生活。源于印度的石窟艺术经过长期的发展，至此完成了中国化的进程。

4. 大足石刻为中国佛教密宗史增添了新的一页

据佛教史籍记载，中国密宗盛行于公元 8 世纪初，流行于黄河流域，至 9 世纪初日本高僧空海将其东传日本后，中国汉地渐至衰落。而北山、宝顶山大量造像及其碑刻文字无可争辩地表明，9 至 13 世纪，密宗在四川不仅未见绝迹，而且处于兴盛。9 世纪末（晚唐）四川西部的柳本尊自创密宗，号称“唐瑜伽部主总持王”，苦行传道，弘扬大法。到 12 至 13 世纪中叶（南宋中期），高僧赵智凤承持其教，号称“六代祖师传密印”，在昌州大足传教布道，创建了宝顶山摩崖造像这座密宗道场，从而把中国密宗史往后延续了 400 年左右，为中国佛教密宗史增添了新页。

5. 大足石刻生动地反映了中国民间宗教信仰的重大发展、变化

信神不信教、信仰多元化，是中国民间宗教信仰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重大变化。大足石刻作为中国民间宗教信仰的产物，便是其重要实物例证。一方面，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三大主体的儒家、

道教及佛教，在其长期的发展进程中，总趋势是由“相互对抗”走向“相互融合”。其表现之一，是使原本属于佛教产物的石窟艺术为道教和儒家所借用，且“三教”创始人不分高下地出现在同一个石窟之中。石刻中有释、道、儒“三教”分别造像者，有佛、道合一和“三教”合一造像者。这些造像表明，10 至 13 世纪，“孔、老、释迦皆至圣”，“惩恶助善，同归于治”的“三教”合流的社会思潮已经巩固，世俗信仰对于“三教”的宗教界线已日渐淡漠。另一方面，大足石刻丰富多样的造像题材又有力地反映出这一时期源于印度的佛教神祇和道教早期的神仙系统已与中国民俗信仰的神灵融合，呈现出信仰多元化的趋势。大足石刻所展示出的这种民间宗教信仰的重大发展、变化，成为后世民间信仰的基础，影响深远。